

現代國家中的自由權

[英] 拉斯基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現代國家中的自由權

[英] 拉斯基 著

何子恒 譯

商務印書館

1959年·北京

Harold J. Laski
**LIBERTY IN
THE MODERN STATE**
Penguin Books Limited
London 1938

現代國家中的自由權

[英] 拉斯基著 何子恒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群刊出版登記證北群字第107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京華印書局印刷 宣武裝訂廠裝訂

統一書號 3017·25

1959年12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數 133千字

印張 5— $\frac{3}{16}$

印數 1—3,200冊

定價(9) 0.75元

出版說明

本書作者拉斯基(H. J. Laski, 1893—1950)是英国当代的反动政治理論家和活动家,工党的領袖之一,在資產階級学术界享有盛名,在解放前我国的政法界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也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一生是为帝国主义資產階級竭誠效忠的。他的思想面貌可以大別为三个阶段:1934年以前,是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出現的;1934年至1945年期間,是个改良主义者;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則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倡導人。总之,他是一个英国型的右派社会党人,馬克思主义的凶惡敌人。《現代国家中的自由权》这本书写于1930年,全部內容在于鼓吹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自由主义。为了弄清这本书的实質和它的作用,有必要先来剖析一下什么是自由主义,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自由主义究竟起些什么作用。

自由主义,也同其他一切思想意識一样,作为社会的一种上层建筑,它的性質和作用随着經濟基础的发展而变換的。自由主义是資產階級革命时期的产物,它代表着新兴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要求:打破封建桎梏、实现統一的民族市場、实行自由貿易和自由竞争,以利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在英国,集中表现在反对绝对君主专制,实行立宪以达到分享政权。因此,初期的自由主义思想是資產階級向封建制度进行斗争的武器,起着革命的进步作用。等到資產階級登上統治宝座,无产階級也相应地强大起来而形成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自由主义就开始丧失其进步性,而成为資產階級对内用以分裂工人运动、对外实行扩张的有力工具之一。由資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自由主义,矛头

就直接对着馬克思主义，走上破坏、鎮压工人运动的反革命道路，最明显的标志是欧洲各国的自由資產階級（自由主义思想的体现者）对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所采取的敌对态度，特别是法国的資產階級，直接参加了对巴黎公社的血腥鎮压。最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到来，自由資產階級轉变为壟断資產階級，这时候的自由主义也就失去了經濟基础和社会支持力而趋于彻底破产。資產階級理論家被迫放弃自由竞争、自由貿易的原則，原来皈依自由主义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各阶层，开始向两个方面轉化：一部分人轉到保守党派和露骨的反动营垒中去；一部分人轉入改良主义或机会主义队伍，閹割和歪曲馬克思主义，企图从工人运动内部来进行破坏。正如列宁曾經指出的，一切資產階級的理論都可以用馬克思主义的詞句来表达。改良主义者特别是机会主义分子就是这样用馬克思主义詞句来乔装自己的。我們說，改良主义或机会主义是自由主义在帝国主义时期的延續和发展，或者說，自由主义在帝国主义时期的表現形式就是改良主义或机会主义，道理也就在此。拉斯基本人是在 1934 年前后完成从自由主义者到改良主义者的蛻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自由主义政党都积极支持美、英壟断組織的帝国主义政策，資產階級早期所吹嘘的自由主义的原則已被踐踏得連一点影子也沒有了。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自由主义从它誕生的那天起，就带有階級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它只有在資產階級作为一个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起来反对封建制度时，才是有进步性的。一俟資本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階級成长起来，工人階級的革命理論馬克思主义出現以后，自由主义就是反动的了。而到帝国主义时期，自由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則都被壟断資本集团所扔弃，而为法西斯主义所代替，如果說自由主义还剩下一点什么的話，那只是一个空壳。

英国是个具有自由主义傳統的国家，而且英国的自由主义一直是同保守思想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英国資產階級統治者从十九世紀中叶起，一貫采取自由主义的策略对待工人运动，那就是用点点滴滴的改良和假仁假义的撫慰，通过收买工人上层分子以麻痹工人階級。这同俾斯麦用赤裸裸的反社会党人法令来回答工人运动的作法是异曲同工的。但是俾斯麦的手法很快就在强大的工人运动面前破产了，而改良主义的誘餌倒确实在一个較长时期内起着欺騙作用，因此英国資產階級的策略是更为狡猾、更为險惡的。英国的費边派从理論上倡导这个策略，英国工党就从实践上貫徹这个策略，拉斯基是一身而二任，既是費边派的理論家，又是工党的領袖人物，他的思想言論，具有英国資產階級統治者代表的典型性。这就是英美統治者之所以器重他，資產階級学者之所以推崇他，而我們必須着重地揭露他和批判他的道理所在。

現在，讓我們来看看拉斯基写作这本书的背景和动机。

1930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已是帝国主义总危机的第一阶段，又值1929年开始的大規模資本主义經濟危机普遍襲击欧洲各資本主义国家的时候，資本主义制度受到重大的震撼。此时，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已經取得政权；在德国，正逢山雨欲来風滿楼之际——希特勒上台的前夕，整个資本主义世界是風雨飄搖，而与此相对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欣欣向荣，苏联全国人民正在为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劃而奋斗。拉斯基在惊惧于苏联的成就和忧虑于資本主义的危殆的心情下，抓住当前的时机，一面詆毀、誣蔑苏联，妄图掩蔽世人耳目，一面拿法西斯的威胁向人們进行恫吓和訛詐，乘机兜售其自由主义理論，以图挽救資本主义制度。这就是他当时写这本书的背景和动机。他在1938年为这本书所写的再版序言中，曾清楚地表白了这番心意。

对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这里不去一一駁斥。总的說来，他同

我們是站在對立的階級立場，他的自由觀是徹頭徹尾為垂死的資本主義服務的。比如，他在这本書里振振有詞，大談其議會民主、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自由與平等的關係等等，看來象煞一個進步的思想家。但是只要把他這套論調拿來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事實面前檢驗一下，立刻就會發現，原來他所講的自由是資產階級統治者有霸占議會的自由、有在議會里大吵大嚷的自由，而勞動人民卻根本沒有參與政權的自由；資產階級統治者有撒謊、造謠、收買報刊的自由，人民則沒有說話的自由；美國國會有通過塔夫特-哈特萊反勞工法案的自由、艾森豪威爾有引用這個法案鎮壓工人罷工的自由，工人卻沒有罷工、沒有爭取改善生活的自由；三K黨有殺害黑人的自由，黑人小学生卻沒有上學的自由；杜勒斯之流有狂吠謾罵的自由，歌唱家羅伯遜卻沒有歌唱的自由。他講自由與平等的關係時，還侈談自由必須以所謂經濟平等為基礎，我們馬克思主義的平等觀，是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消滅階級，拉斯基既然在全力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所謂經濟平等之說，只能是欺人之談，所以，歸根結蒂，拉斯基所講的自由、平等只是少數剝削者的自由和平等。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沒有、也不容許有這種自由和平等，但是，在某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中，這一套謬論至今仍被奉為至寶，而且時時企圖利用這些幌子為資本主義復辟開辟道路。因此，徹底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的謬論，還是當前思想戰線上的一項重要的任務。

拉斯基的這本書在1932年曾由本館翻譯出版，當時，它是作為資產階級政治自由觀的代表作來加以介紹的，為了肅清這一思想的殘余影響，我們請原譯者根據舊譯重加修訂並予出版，供批判參考之用。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1959年11月

目 录

序	2
塘鵝文庫版引言	3
第一章 序論	33
第二章 心灵的自由	68
第三章 自由权和社会的权力	118
結 論	156

序

1929年夏，我被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邀請去作考而佛（Colver）演講；我以能接受这一邀請而引为荣幸。但由于几个月后，我被任命为大法官代議立法委员会委員，不得不中止这次講学。不过我認為在目前印出这份講稿（演講的一个条件）或仍适应需要。

本書有沒有可取之处，将由本書的內容來說明。我在这里，只想向帮助我完成此書的許多朋友、尤其是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荷姆斯（Justice Holmes）、已故的霍勃豪斯（L. T. Hobhouse）教授、湯尼（R. H. Tawney）先生和佛朗福特（Felix Frankfurter）教授表示謝忱。倫敦經濟政治学院研究院的許多學員差不多曾将原稿逐字逐句加以校閱，我也应对他們志謝。当然，我在这本書里所發表的意見还应由我个人負責。

H. J. 拉斯基 1930年1月1日于倫敦經濟政治学院

塘鵝文庫版引言

自从本書首次出版到現在的七年中，在大部分的文明世界，自由权的情况显然恶化了。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夺得政权，只是广泛而深刻地攻击自由和政治民主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实例。宪政的原则，到处都需要维护。对于国际法的尊重，似乎也在我們的眼前衰落了。我們过去深信由于无知的反动而产生的对人种的和宗教的偏見，現在却被作为民族政策的根据；人們看到，有学問的人也会絕灭自己的良知，和这种野蛮主义的言行沆瀣一气。在奥地利和希腊，在西班牙和大半个巴尔干半島，代議政治，在任何重要意义方面看来，都不再存在了；而且在最近的将来，都沒有恢复的可能。甚至象法国那样的国家，有时公众的自由权也受到反动势力的严重威胁；在大不列顛、斯干的那維亞和美国，虽然似乎有着比較令人愉快的紀錄，但对于自由的前途，也沒有人能作肯定的論断。我們感到人类或許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目前国际方面的严重不測風云，假使再演为另一次大战，自由很少有繼續存在的希望。当然，很少有認真的思想家会对这点表示怀疑。

这种恶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象德国人民那样的一个大民族，不会輕率地将它的社会和精神生活的每一方面的思想自由加以摧毀的。它也决不輕易容許宗教信仰被全面攻击，它的科学方面和宗教方面最偉大的思想家被放逐，它的工人阶级运动被破坏，它的法治被推翻，整个民族的法律保护权被剝夺，它的报纸、教育制度和一般文化机构被降低到成为毫无生气的、无意識的政府

宣傳部門。它不会，至少不会安心地将 1934 年 6 月 30 日那样的大暗杀暴行抬高到和至高无上的正义原则同等的地步。并且在这一切作为方面，德国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威尔斯(H. G. Wells)称为“粗厉的声音”的东西似乎能在人类广大的地区上胁迫人們去屈从它們的意志。它們将思想的自由看得一錢不值。它們不許有結社的自由。正常的法治被歪曲到为它們的任意妄为的行为服务。它們拒絕尊重国际义务。它們对于行动的自由加以 30 年前所梦想不到的限制。在它們不惜任何代价的权力追求中，它們抛弃了社会改革和个人幸福的理想。它們恢复了人質的法律。它們干出的殘暴行为是这样的粗野，干出的丑事是这样的非言語所能形容，以致一提起它們的这些罪恶就会使平常人羞愧得无以自容。在一种比路易十四和拿破侖所曾敢于要求的更为深刻的意义上它們强使人們承認它們就是国家，并且，它們已經在强迫人們去崇拜西方文明自黑暗时代以来从未見过的强迫行为，并为它們的强迫行为服务。

它們的权力，大半建立在科学的恐怖組織上；当对付抗議的刑罰是死罪、拷打和囚禁的时候，人們就不敢輕易提出抗議。但是这些年来，奇特的就是：崇拜独裁者的并不限于除了支持独裁者以外別无办法的一些人。就在自由还未被抛弃的国家里，也有一些公民，不是苟同于这些暴行，就至少要坚持这些事情和我們沒有关系。杰出的政治家們觉得这些所謂新复兴时代的大好佬，即使不值得仿效，但至少也值得我們寄以友誼。他們还想法来压制对于独裁者的胡作妄为的批評。他們認為这班人的殘暴和他們所能組織起来的成就比較起来，是輕微得微不足道的。他們宣称，从正确的角度上看，德国自由的毁灭实在是它的公民紀律的恢复。至于使世界进行一个新的瘋狂的軍备竞赛、煽起新的世界战争危險的那个外交政策，在他們解釋起来，就該理解为德国自尊心的恢复。那

种恐怖的手段，在苏联运用的时候，就会挑起他們对苏作战和抵抗的行动；但在德国运用的时候，他們看了不但没有什么憤慨，反而認為那是他們所能贊成的社会制度所必須支付的代价。他們甚至着重地警告我們說：德国在新秩序之下，已将世界从不可忍受的恐怖中挽救出来了。

德国自由的毁灭只是最近 7 年中洗滌欧洲的一般潮流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例。奥地利和意大利，希腊和巴尔干有着同样的經驗，虽然程度差些。日本受着帝国統治欲的驅使，并且和德、意有密切的精神联盟，在它所有的意圖和目的上，已变成一个法西斯的国家。南美洲各国，除了墨西哥一国而外，都在或多或少的極端型态上，固着于独裁政治。就是那些現在还享受着政治民主的国家，也担心着政治民主的前途。在法国和比利时，都有着有影响的法西斯运动。英国方面所以能免于严重的法西斯运动，或許并不是由于对自由的强烈热誠，而是由于 1931 年来工党运动不能或不願严重地威胁社会生活的現有結構。在美国，一場严重的战斗正在两派之間进行着：一派主張維持有产者对于政权无限制的控制；另一派，如美国总统，为了群众的利益，設法限制这种控制。在美国令人注意的事实是，那兒虽然已經有了两度偉大的民众的胜利，但是這場冲突的結果还在未定之天。這場战斗不仅使宪法受到極大的濫用，同时也产生了一类典型的、象最近去世的參議員朗恩 (Long) 和柯灵 (Coughlin) 神父那样的法西斯煽动家。这些人只要政局稍有变动，不难跃居显要的地位。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的主要爭端轉到了这方面，即劳方要爭取通过他們自己所选择的組織和資方集体訂約的权利；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总统 5 年以来是支持劳工方面的，但是這場战斗的結果仍然沒有分曉。

这里順便說一下，美国議會中的社会立法的制訂，在英国早已成为具有二三十年历史的常事，而美国总统却受到富人們大大的

仇恨，其程度的強烈，為內戰以來所未有。總統迫使財產權力受到社會控制的努力已在美國生活中凿開一條洪溝；跨越這條洪溝，還可能在美國民族史上引起一個革命的危機。

無疑，在這一片自由日見衰落的沙漠上，還存在着一些綠野。可是，能夠標志出我們時代的性質的，沒有一件比得過在西班牙已經進行一年以上的內戰了。這不僅是因為這種內戰進行得特別劇烈，也不僅是因為舊的特權階級、軍隊、貴族和教會勾結一起，陰謀推翻用民主方法選出的西班牙立憲政府的緣故；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種陰謀是和德、意兩國協同策劃出來的，而德、意兩國都參與了這個陰謀的開始和發展。同樣重要的，就是當英、法設法防止西班牙戰爭演變為歐洲戰爭而在列強間簽訂一種不干涉協定的時候，德、意兩國的統治者表面上雖然加以接受，事實上始終規避着協定的履行，不斷地為西班牙叛軍輸送大量的人力和軍火，現在全世界都感覺到：在這種不干涉的諷刺性的悲劇中，唯一的結果就在使民主國家否定了民主西班牙以憲法政府的資格在國外購買軍火的權利。在不干涉協定簽訂以前，民主西班牙從蘇聯得到過援助；在醫藥救濟和其他類似的人道主義措施方面，它也得到世界所有自由國家的有組織的勞工方面的同情鼓勵。在它的軍隊的行列中，也有近二萬名志願軍為自由事業冒着生命危險而在那里仗義作戰。可是民主西班牙卻不能從民主國家得到一點有組織的援助。它們任令它成為一個法西斯所周密設計、切實執行的演習場所，不願意在任何方面承認這一鬥爭的意識上的意義。民主英國的一位知名政治家還甚至宣稱：那兒的衝突只是一種“派系鬥爭”，他本國的公民是不可能對它發生興趣的。

二

這種重大發展究竟由於什么原因呢？為什麼一個方在1919

年从保衛民主、抵抗軍国主义进攻掙脫出来的世界，到了 1937 年又面临着一个大家几乎一致認為自由的观念将在其中被消灭的新斗争的威胁呢？在 1919 年的时候，不仅是战胜国，就是战败国，都觉得民主和国际和平已成为人类固定習慣的一部分。战败了的德国自动地在魏瑪宪法中采取了每一种自由宪政的主要原則都有规定的国家形式；同时国际联盟的盟約也喚起了全欧普通人民、其中許多是有組織的劳动者的热誠信仰。但到了 1937 年的德国再也沒有一个人对魏瑪宪法給予一点惋惜的回忆了；同时，今天也沒有一个国家具有任何信心，相信国联盟約在现实观点上真能防止灾禍。1931 年的中国东北、1935 年的阿比西尼亞明白地显示出：不接受国联盟約前提的人就是那些曾大吹大擂自称为人类开辟了新紀元的那些人。在內和在外我們都卷入了一种緊張的权力冲突，这使我們有面临毁灭的危險。在国内有隱蔽的階級战争；在国外有随时可以爆發漫天战火的威胁。这些都附随在我們政策的每一个主要項目上。經濟的民族主义从来沒有这样的强烈；国家控制个人的行动也从来沒有像今天这样广泛。一个結束战争的战争，即是“使世界安全以利于民主”的战争，演成了一种到处都是战争和它的孿生姊妹——革命的景象的局面。我們怎样才能解釋在战后期間所开始的全部期望的这样猛烈的逆轉呢？

这一点至少是可以肯定的，我們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不安定。和往常一样不安定就在人們心中培养出和自由不相容的恐怖和仇恨来。因为自由只能存在于有容忍的地方；理智不可能在其他的空气中行使其絕對的統治权力。但存在着憤怒情緒的地方不可能有容忍，因为意气从事的人就不注意辯論。只有在容許和願意接受用理性討論的方法达成和解期望的环境中，才能有容忍。但我們的时代很少有这样的气氛。一部分原因，无疑由于上次大战所確認的暴力冲动还没有安靜下来。一个靠强力加在他人身上的

不良的和約缺乏同意尊崇其条款的权威。它严重地打击了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尊心。这个打击反应到那个批准接受这一和約的政权身上；并且这个政权在經濟上是不成功的，也从沒有和战胜国在平等地位上相見的机会，这就剝夺了它有效地統治它自己的人民的权力。在整个世界上，大战将暴力尊崇为一种变化的技术。对千百万的群众来講，大战已使强权变成正义的别名；它到处留下成群的亡命之徒，而他們却不顧一切地想把不适合法治的習慣推行到和平的时代中来。

曾經有过不安定；正如本書所說的那樣，不安定是自由的主要对立面。但是不安定并不是大战的产物；大战本身就是我們社会制度基础上存在的不安定的一种極度的表現。因为大战并不是任何国家的政治家故意罪惡地选择的結果。迭更生 (Lowes Dickinson) 說得好，它是由国际的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同时，这种无政府状态又根源于彼此相互竞争的經濟体系，这种經濟体系受其內在邏輯驅使去以战争达成和平方法所不能或不能迅速达成的目标。1914年的大战，現在看来，已成为国家政策的至高无上的工具；尤其重要的，就是我們从国际联盟的經驗上知道：这个組織只要它的盟員一天是主权国家，便沒有达成它任何主要目的的可能。我們这个时代最大的需要就是世界性的立法；但是主权的实質就在于享有主权的人們，除了他們自己的意志之外，不受法律的約束。他們單从他們自己利益的观点去考察主权。無論对于关税的高低或劳工的标准，移民的自由或軍备的数量，他們从他們認為他們可能被要求加以维护的目前或远期的目标所需要的权力来考虑他們的政策。至于那些目标，多半是由以利潤动机为基础的那种經濟制度的关系决定的。在社会中占有經濟权力的工具的那个阶级，总是利用它所控制的国家为它获取利潤开方便之門。它所用的方法可能是直接的，象意大利千方百計地希望征服阿比西尼

亞，日本用武力占据了中国的东北；也可能是間接的，象德国支援佛朗哥，以便获取西班牙丰富的矿藏。总之，在国家政策的复杂动机的基础上，都可以发现資本所有者在追求利潤时利用国家主权来维护其心目中的目标。

但是国际間的无政府状态，就它本身來說，也仅仅是一种国家的病态的反映。工业的扩张使一个新的阶级获得了政治权力。他們是用自由的名义取得政权的；他們当时也能和工人阶级結成联盟而达成他們的目的。他們胜利的代价就是資本主义民主的建立。这样实现的革命意味着工人阶级可以用选举权向生产工具的所有者索取物質福利上的讓与。工会的被承認、工人的損害賠償权利、工时的限制、工矿中的安全和衛生法規、社会保險和国民教育制度——这些例子都是資本家为了取得工人阶级的合作，以推翻地主貴族的社会控制所付出的代价。一般地說，在新社会扩展的过程中，这种代价是以相当愉快的心情支付的。从它大量的利潤中，这个阶级可以满足群众不断增高的生活水准的需要，而不致于損害它自身的安全。但当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繼續扩张越来越困难的时候，这个新社会的各种問題也愈益复杂了。到了这一个阶段，每一个新的群众要求都成为对于特权的威胁。这时，社会的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間的矛盾，也变得更加明显。資本主义發覺它的处境是：社会福利每向前推进一步，資本所有者在世界市場上的竞争力量也更加受到了危險。它必須或者向群众的权力讓步，寻求民主的所有权和生产資料管理权；或者轉向压制民主，把它当做是和資本主义的本質絕不相容的生活原則。

这种不相容性，可不是大战所造成的；大战只将它的外貌更加緊張地尖銳化吧了。通过了俄国的革命，大战建立起一个决然反对其自身的要求的大民族社会。它加强了經濟的民族主义，但因此而引起了生产力和进入世界市場的力量之間的矛盾，使获取利

潤的能力增加了困難。進入世界市場的必要性，又引起了一個尋求降低成本的廣大的科學革命；這又意味着成百萬的人群被拋出工場，驅使他們去尋求國家的支持。大戰還有兩種非常重要的心理上的反響。它喚醒了殖民地人民強烈的民族自由的願望。這一個運動的結果威脅着帝國的統治，使權力的不穩定情況嚴重地尖銳化了。還有，交戰國家為了爭取勝利，都對群眾提出了在戰爭結束時大大增加福利的諾言。這些諾言造成了巨大的期望；戰後，群眾不僅希望其實現，而且為了實現這種期望，他們也能通過政治民主制度，強烈地施加壓力。

初從戰爭的壓力下解脫出來的時候，一般人當然都覺得一個新的寬宏大度的時代可能開始了。可是這種空氣沒有延續多久。改良主義的政府的代價是巨大的；這類政府到處都得不到習慣於旧時經濟組織方式的商人們的信任。大家很快就明了：任何全盤改造的切實步驟都要廢止依存於經濟權力所有權上的特殊權益。那些財主不準備犧牲自己的特殊權益，不亞於 1848 年或 1789 年他們的前輩。他們毫無困難地將自己反對根本改變的那些主張加以合理化。但在合理化的過程中，他們不得不接連拋棄他們在資本主義擴張時期所承襲下來的自由主義的各項原則。工會到了能夠發動總罷工的時候，他們變得更为危險。社會主義的政黨，到群眾可能接受其勸說而授以指導國家的大權的時候，就越發有威脅性。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到那時也就不再是抽象的議論，而成為實際的立法了。同時，那種立法，不僅包含着主要落在富有者身上的捐稅的增加，也會意味着社會化的工業的繼續擴大，特殊權益的繼續廢止，和一個平等社會的成長。

民主國家里政黨的衝突，在戰後改變了衝突的性質和方向。直到 1919 年為止，社會主義的政黨在西歐議會中不是沒有什麼重要的代表，就只是充當自由派政黨的附庸，像在英國那樣，雖能對